



文学操纵与时代阐释

——英美诗歌的译介研究(1949—1966)

吴 赞 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

文学操纵与时代阐释

——英美诗歌的译介研究(1949—1966)

吴 贇 著

 復旦大學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学操纵与时代阐释——英美诗歌的译介研究:1949~1966/吴赞著.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1

ISBN 978-7-309-08559-4

I. 文… II. 吴… III. ①诗歌-文学翻译-研究-英国-1949~1966-英文
②诗歌-翻译-文学翻译-美国-1949~1966-英文 IV. 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23441 号

文学操纵与时代阐释——英美诗歌的译介研究:1949~1966

吴 赞 著

责任编辑/庄彩云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200433

网址: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86-21-65109143

上海华教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8.125 字数 230 千

2012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9-08559-4/I·648

定价:20.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内容提要

本书以1949—1966十七年间翻译文学在中国的生存语境为背景，通过译介建构的“英美诗歌图景”，以史为本，史论结合，以论概史，描述并分析了此间英美诗歌在中国的接受历程和影响面貌。从选择对象、表现主题、构成经典到影响本土创作，英美诗歌译介都集中化、同一化地表现出时代政治的操纵性话语特征，其激情与内涵既反映了此阶段中国的历史、社会与文化现实，也书写了一段特殊的断代文学史。

序

史志康

吴贇是个才女。在我记忆中,她很擅长描写、抒情,擅写婉约的文字,比如 柔和似絮的浮云,载着清澈的月光摇荡海波;又如争奇斗芳的各种花卉,随路流转泛着涟漪的溪流,让人编织飘飘的幻想。读了她的专著《文学操纵与时代阐释——英美诗歌的译介研究(1949—1966)》之后,我看到又一个吴贇:她还能写充满思辨的文字,在缜密、理性的论证中,让思考如瀑布翻滚,在嶙峋怪石上激扬水花。

这本专著,围绕着“意识形态”、“文化操纵”、“翻译规范”、“动态经典”等关键词,在建国后 1949—1966 十七年的历史经纬之中,深入、系统地分析英美诗歌在中国的接受与影响情况。“十七年”的特殊性直接影响了英美诗歌在中国的生存面貌,意识形态及话语权力实现了对英美诗歌的文化操纵和利用,形成了文学的以政治权威为基础的方法论体系。这本书立足于英美诗歌所特有的激情与内涵,较为全面地解读了十七年间英美诗歌在中国被阅读、批评等的流传、发展历程,也使得这本书的价值和意义超越了单纯的语言与文学层面,翔实地反映了此阶段中国的历史、社会与文化现实,较为有效地去除了一直以来对于这一时期外国文学译介的成见和偏见,完成了对一个翻译断代文学史的阐明和深入。

吴贇是我的博士生,我对翻译学专业的博士生授课多注重研读经典、翻译经典并还原经典。吴贇对于诗歌的悟性使得她在从事翻译研究时,相比旁人更具有敏锐的体悟和把握能力。而在这部脱胎于博士论文的专著中也看出她对于翻译理论的理解和运用十分到位。能够将诗歌的感性和理论的理性充分结合,在尘封的史料中再现十七年英美诗歌在中国的变形和再生,填补这一块研究空白,我对她的努力和成就感到由衷的高兴。

近年来,我一直在重译《论语》,并征引西方经典,进行比较、对照及解读。年初,我的一个至友送给我一本台湾学者薛仁明写的书,名为《孔子随喜》。书中认为:“孔子的世界水深浪阔,蓄得了鱼龙。”孔子门下鱼龙众多,号称三千,但重点不在于这量多,在于色色鲜明。他教育弟子并非用一种划一的模式去规范学生,而是根据每个人的天性,给予阳光、空气、水分,偶尔见到过多枝蔓时做一点修剪工作。我认为,一个好老师就应该这么做。因此,学生的成果,学生的勃勃向上的事业,都是他们天生的聪明,以及后天的努力。作为老师,我不敢居功,但我会感到由衷的高兴,并向他们祝贺,因为新一代学者的成熟是我们事业最可靠的保证。我相信,吴赟的学术之路必将越走越为宽广,我也衷心地期待能见到更多她的著作面世,为我们方兴未艾的翻译事业增添富有创见的维度和视角。

写于荷马史氏斋

2011 年秋

目 录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 文献探讨	1
第二节 研究目标	3
第三节 研究思路	6
第四节 研究方法	8
第五节 研究内容	11
第二章 十七年间文学翻译的时代语境	14
第一节 文艺工作语境	15
第二节 翻译文学语境	18
一、建国初“一边倒”的文化背景	19
二、20 世纪 50 年代中后期文艺政策的调整	21
三、直至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的运动风潮	23
第三节 一元化的操控	25
一、计划化和组织化	26
二、外国文学翻译概况	29
三、英美文学翻译概况	34
第三章 十七年间英美诗歌翻译流派分析	38
第一节 英美诗歌译介概述	38
第二节 诗歌译介流派分析	41
一、英国诗歌的译介	42
二、美国诗歌的译介	54

第四章 十七年间英美诗歌的选择和翻译	64
第一节 译介资格的获取	64
一、指导原则:强势话语下的“两结合”	64
二、译介资格:革命言说的身份甄别	69
第二节 翻译的择取策略	78
一、主题的政治择弃	78
二、序跋的解说策略	98
三、内容的可接受性	102
第三节 译诗的语言风格	131
一、一般化与庸俗化	132
二、艺术创造的标准	140
第五章 十七年译介中的经典建立与颠覆	149
第一节 英美诗歌译介经典的建立	150
一、国家话语的制导	150
二、精英与大众话语	151
三、遴选、认定与确立	152
四、静态经典的沦落	158
第二节 惠特曼在中国的经典构成	161
一、惠特曼在本土的经典建立	162
二、惠特曼在中国的经典之路	165
三、十七年间译介的经典构成	167
第三节 拜伦译介从经典到去经典	180
一、经典的生成与确定	180
二、经典的没落与颠覆	182
三、经典的让位与替代	186
第六章 十七年间诗歌译介与创作的互动	190
第一节 本土诗歌的特点	192
一、意识形态的张扬	192
二、多元形态的共存	194

第二节 英美译诗的影响	197
一、激情的使命	198
二、民歌的素朴	212
三、浪漫的秩序	218
 第七章 结论	 223
第一节 翻译的文化操纵	223
第二节 一个时代的阐释	227
 附录一 1949—1966 年间出版的英国诗歌译本	 230
 附录二 1949—1966 年间出版的美国诗歌译本	 232
 主要参考文献	 233
 后记	 251

第一章 绪 论

诗歌是文明的素养,充满着感召的力量和激情。对诗歌的翻译引领人们走入另一种文明,在文化的视阈内寻找相互之间的呼应和对比,映照自我与他者世界中迥异或重叠的价值观、生命力和时代意义。1949—1966 十七年间的英美诗歌在中国的翻译和接受承载并释放着特定时代的价值观、生命力和时代性,既具有这一阶段独有的文学和社会特征,也承上启下,构成了宏大的文化体系中一道不可或缺的历史图景。

第一节 文 献 探 讨

中国对英美诗歌的译介始于 19 世纪中期。美国诗人朗费罗(Henry W. Longfellow)的诗作“A Psalm of Life”由当时的英国驻华代理公使威妥玛(Thomas Francis Wade)逐句翻译后,经时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全权大臣的董恂改裁为七言长诗。其后,英美诗歌如潮水般涌入,二百余年,构架并繁荣着中外之间的文学与文化交际。在英美诗歌的译介、传播过程中,旧的文化体系和新的文化体系不断碰撞、磨合,随后互相制约、互相权衡,冲击并引领着当时的诗学习习惯、价值观念与社会思潮。清末民初如此,“五四”新文化运动如此,“文革”后的新时期也如此,相关译论、评介和研究层出不穷。

相形之下,新中国成立后 1949—1966 十七年间的英美诗歌翻译遭受了冷遇。目前,专门研究建国十七年英美诗歌译介情况的论文或专著并不多见。

1996 年孙致礼编著的《1949—1966:我国英美文学翻译概论》(译林出版社,1996 年 12 月)是第一部分章别类地论及十七年英美诗歌译介的著作。书中翔实地描摹了这段时期内诗歌翻译的情况,逐一介绍了如方重、朱维之、王佐良、查良铮等诗歌翻译家及其译作,并总结了

译介过程的经验、贡献与启示。这种以翻译家为主线的评述张扬译者的贡献,注重译者语言技巧的表现,具有一定的价值与意义。但是,此书对译介情况的分析和梳理更为侧重语言学派规约式的微观研究,没有深入研究原作、原作者、时代语境、译诗在接受情况等制约翻译的种种因素。

另有一些学者所著的中外文学关系史,以通史和专门史的形式,涉及十七年英美诗歌翻译的论述。如1989年陈玉刚主编的《中国翻译文学史稿》,1999年周发祥、李岫主编的《中外文学交流史》,2004年葛桂录的《中英文学关系编年史》,2005年孟昭毅、李载道主编的《中国翻译文学史》。这些著述罗列及梳理作家和译作史料,也分别提到十七年间的英美若干诗歌译作,但往往只是浮光掠影的分析。一方面,这些文学史的编著虽也关注译作的传播、影响和接受,从材料的点滴收集到对材料有意识的梳理,对翻译现象进行描述和总结,但是,这些著作对专项文学体裁,譬如诗歌的翻译研究因限于篇幅,无法对专题进行较深层次的挖掘和研究。另一方面,这也与大众认识十七年的普遍心态有关系,“认为‘十七年’外国文学翻译完全意识形态化,没什么研究价值。”^①政治因素对文学作品的制约,成为十七年译介研究不言而喻的事实,但由此也往往成为一个不证自明的前提和结论,至于政治因素到底如何影响翻译的决定,如何影响英美诗歌的译介面貌,如何决定该时期的诗歌视野,却缺乏相应的具体探讨。翻译研究也就被剥离于动态的历史语境之外,缺乏对翻译动机、背景环境、翻译策略、接受与影响等的讨论。

20世纪90年代末起,对十七年译介的总体论述中开始糅合了当代翻译研究的各种理论。如王宏志在《重释“信达雅”——二十世纪中国翻译研究》(1999)借佐哈尔的多元系统理论,对翻译学在“十七年”中国整个社会文化系统所处的位置及发挥的功能作了扼要的剖析;查明建的《文化操纵与利用:意识形态与翻译文学经典的建构——以20世纪50至60年代中国的翻译文学为研究中心》以文化学派的

^① 方长安:《建国后17年译介外国文学的现代性特征》,《学术研究》,2003年第1期,第110页。

文化改写理论为据,考察当意识形态处于文化多元系统主导地位的情况下,其对 50 至 60 年代中国文学翻译选择和翻译文学经典构成的操纵,揭示翻译的操纵及政治利用的文化性质;方长安的《论外国文学译介在十七年语境中的嬗变》、《1949—1966 中国对外文学关系特征》、《建国后 17 年译介外国文学的现代性特征》等文章探讨了“十七年”政治意识形态对外国文学翻译的制约。这类论文与著述弥补了前期文学史编纂的不足,开始关注人与文本在历史语境下的变迁。但是对十七年的翻译文学多处于粗线条描摹的状态,没有细致地展开论证,对如小说、散文、诗歌等不同文体的各自译介也没有较为完整的研究。

由前可见,十七年间的英美诗歌译介虽已有一定的介绍,但总体而言,仍流于片断性的星散分析,局限在相对简单的研究方法中,缺乏史论结合的完整论证。本书研究的目标正是力求填补这一片留白,在前人研究基础上,清晰、深入、系统地分析 1949—1966 十七年间的英美诗歌译介的起承转合。

第二节 研究目标

本书研究缘起于一个单纯而持久的初衷:对诗歌语言及翻译的热爱。然后愈深入 1949—1966 这一段特殊的时期,愈探究英美诗歌在其中的命运沉浮,就愈发觉许多的翻译现象需要重整,许多蒙尘的史料需要厘清,需要重现在历史的经纬之下英美诗歌的本真形象和接受面貌。

实际上,本书对 1949—1966 十七年间的诗歌翻译研究,是对一个特殊历史时期的翻译文学史的阐明和深入。本书的研究目的,是依托 1949—1966 十七年的时代语境,阅读、归纳、分析这一阶段的诗歌文本、翻译过程、接受情况,从而总结出属于十七年所独有的诗歌美学、文学本质和时代特征。具体而言,本书将以如下层面为研究目标:

1. 阐述 1949—1966 十七年间英美诗歌翻译的基本特点

1949—1966 年间诗歌译介的过程作为在场的现在,是对过去的继承和拒绝,也同时包容了对外来的预期。这十七年的诗歌译介承袭了自“五四”以来形成的一整套西方诗歌体式,融合中国的历史与现实,

以此改变长期以来在新诗发展中存在的不合理现象。当时的诗歌译介一方面并没有忘记从诗歌本体的角度对译诗语言进行精研和锤炼；另一方面更多的是从政治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颠覆旧的格局。在强烈的政治制度化的背景下，英美诗歌翻译的选择努力消除其个性与异见，服从于规范性的主流话语。从翻译选择规范入手，就可分析出本时期中译语文化中制约翻译的特征，并由此分析出这个相对一体化的诗歌体系是如何建立的。

2. 阐述 1949—1966 十七年间意识形态、诗学与诗歌翻译选择规范的关系

建国之初，毛泽东逐渐实行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国策，意识形态下的阶级斗争被置于举足轻重的地位，或一言兴邦，或一言丧邦，诗歌翻译也被置于权力话语的领导和监督之下，不可越雷池一步。当时被选择翻译出版的众多英美诗歌，虽然在思想意识上与社会主义话语属于不同的政治文化体系，但其中蕴藏的精神和气质与新中国政治意识形态话语相契合，或揭露资本主义的黑暗和罪恶，或批判封建主义的压迫和剥削，多凸显对理想百折不挠的追求，对人类乌托邦美好愿景的向往，成为社会主义文学话语构建的重要诉求。作为一个政治思想上高度统一的时代，诗歌、散文、小说等文学形式均围绕在政治意识形态的周围，公开发表的声音不能违背无产阶级人民政权的权力意志。在这种强势的思想笼罩下，英美诗歌翻译被纳入了政治版图，被作为意识形态的工具在现实生活中抛头露面，很明显地体现了向“文以载道”的皈依。因此，对此期间意识形态、诗学与诗歌翻译选择规范三者之间关系的研究将使我们清楚看到 20 世纪 50 至 60 年代中国对文学翻译的操纵及政治利用的文化实质。

3. 探讨 1949—1966 十七年间译者意识形态在英美诗歌翻译中的作用

就十七年的英美诗歌翻译而言，译者对原文的接受过程就是对文本的再创造过程。译者不仅是原作的读者，还是译本的作者。十七年特殊的政治制导性使得该时期的译者承担了更为复杂和艰巨的任务。译者

既要注重如何再现原作的思想信息、审美信息和语言风格等特征,又要具备充分的政治敏锐性,选择具有人民性的、积极的、光明的原作来译介。严格来说,当时的译者并没有自由选择翻译的权利,翻译工作的选材、组织、出版、发行,以及一切的传播媒介都被纳入国家的计划轨道,这样,就形成了十七年的英美诗歌翻译从生产到消费的计划网络,实现了全面的计划化控制。在翻译过程中,译者首先是作为文本的读者身份对原文加以理解阐释。在这一过程中,译者需要调动自己的情感、意志、审美、想象等文学鉴赏和文学批评能力,发掘作品的思想内涵和美学意蕴,将作品用另一种语言具体化并审美化,实现文本意义的完整构建。本书将分析译者在主流意识形态和诗学的制约下,如何运用适当的阐释策略和翻译策略来完成这一时期的诗歌译介。

4. 探讨翻译诗歌经典的形成及其文化意义

主流政治意识的无所不在与诗歌审美的个人喜恶在十七年里相互碰撞,前者压倒性的权威使得后者屈从于它。这阶段的译者或是刻意迎合政治的要求,或是在政治意识的允许和鼓励之下让个人的性情尽量吻合于此,选择诸如“进步和革命意义”的、“人民性的”原作来译介,英美诗歌翻译动态经典的形成就源于此,如对英国宪章派诗歌的推崇、对惠特曼诗歌的热情追捧、对拜伦诗歌的态度变化等。本书将从诗歌翻译建构和嬗变的角度,探讨1949—1966十七年间诗歌翻译经典形成的特点,并由此探讨此时期诗歌经典的意义所在。

5. 探讨英美诗歌翻译与本土诗歌创作之间的关系

诗歌文本多呈多层面和开放式的图式结构,其意义的实现凭借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对感觉和知觉经验加以具体化,填补作品中的空白处,最终完成文本。译诗是“一位诗人跨越了文化和语言的障碍,与在不同文化传统下用另一种文字写作的另一些诗人的心灵上交流的产物。”^①译者对翻译作品的操纵影响了译诗对诗歌创作的借鉴。本书

① 周珏良:《穆旦的诗与译诗》,杜运燮等编:《一个民族已经起来》,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2页。

从文学操纵的角度,探讨十七年间诗歌创作的特点,并继而分析英美诗歌与中国本土诗歌之间的互文关系。

6. 论证翻译断代史的研究方法

本书对1949—1966十七年间英美诗歌在中国译介情况的考察、分析和论述,实际上是对特定时期的翻译断代史的研究。十七年的背景下,英美诗歌的译介呈现了政治工具性和文学审美性的兼容,在一元价值的向度中,政治主流话语驾驭了并强势挤压着译者的思维与追求,向着“文以载道”的观念模式迅速回归。本书将在研究过程中,对拓展翻译文学史研究方法做一些探讨。

第三节 研究思路

传统的译学观念束缚于原作中心的思想,为“信”、“达”、“雅”、“直译”、“意译”等概念争执不休,执著于如何进行翻译的语言转换,关注的范围不外乎翻译风格、原则、标准、性质等,大多是翻译实践的经验、体会、总结及由此而来的观点和主张。孔慧怡曾就此指出传统翻译研究的局限:

“过去中国的翻译研究,一直以语言分析和文本对照为主要任务,很少涉及翻译活动如何在主体文化里面运作的问题。在这样的研究范畴之内,从事研究的人很难脱离‘原文’观念的限制,也因此绝少触及翻译活动所能产生的庞大文化力量,以及翻译活动和主体文化之间的互动作用……翻译是否能造成文化影响,又或是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其实并不在于语言转换的过程,而完全视其主体文化如何制约,又如何接受这个过程的产物,所以如果我们把眼光局限于文本或翻译机制,而漠视主体文化所发挥的决定性作用,面对中国翻译传统如何丰富的材料,实在让人有入宝山而空手回的感叹。”^①

十七年间的诗歌翻译凸显了压倒性的意识形态,在翻译研究中总是被认为文学价值不大,语言分析和文本对照的方法在这里不由自主

① 孔慧怡:《翻译·文学·文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3页。

地让位于政治语境下的话语特色和权力,所以这方面的研究多被边缘化,甚而刻意地被冷落和遗忘。

在翻译观念和理论不断更新的今天,中国翻译研究所处的文化语境已经发生了变化,因此我们有必要调整、充实并更新对翻译和翻译研究的认识。在这种背景下,随着各种西方翻译思想纷纷涌入中国,中国的翻译研究者视野大开。语言学派、多元系统学派、阐释学派、解构主义流派等纷至沓来,国内对这种种理论的译介和诠释越来越全面及时,而经过译介、诠释和解读的各种理论迅速影响中国译论,在翻译研究领域占据中心位置。自此,译学界从更为宽广的视阈上去诠释翻译中的各种现象,其研究横跨文艺学、美学、语言学、哲学等多种学科,借鉴如解构主义、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文学解释学等当代各式文化理论。

受到极大冲击和影响的译学译论由此渐渐跳出了传统的视阈和藩篱,转而并重宽容宏大的描述性研究和具体而微的规约性研究。它迥异于先验主义和规范主义的原则,强调翻译研究的多元性和宽容度,“描述译者能用的和已用的种种可能的策略”^①。翻译被放入了政治、意识形态、经济、文化的宽广语境中去研究,规约性的范式局限性得到了充分的弥补。

就十七年的英美诗歌翻译而言,历史的、功能的和文化的描述与具象的文本分析是本书展开研究的两条主线。

其中,对于历史的、功能的和文化的描述着重探讨文本之外的制约因素,如翻译动机、背景环境、翻译策略选择的文化动因、译文发表、译文接受与传播,以及在社会的影响等。它们在译介过程中扮演的角色轻重,成分多寡,直接影响十七年诗歌译介的整个走向。这种研究手段描述十七年诗歌译介活动和作品在当时语境下的原貌,希望从中概括出某些原则和规律。

具象的文本分析立足于十七年诗歌译介的表现形式、语言特征、诗体和文本功能的转换机制,以及译诗与当时新诗创作之间的互动,等等。对不同诗歌个案的分析和总结是理论建构的必备条件,这种对

^① Andre Lefevere, *Translation, Rewriting &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1992, p. 101.

文本的微观分析是翻译研究的基石所在。但是,这种细致的基础性研究并不苛求字比句次的完全对等与忠实,也并不脱离历史、文化的背景语境。相反,这两种研究方法是从内到外、从微观到宏观的合作模式,两者的相互作用犹如望远镜和显微镜的不同作业与功能,不可偏废任何一方。

从研究的构架来看,本书将不局限于对文本审美性的阅读,还要将视野延伸到文本背后,研究文学翻译选择的倾向和动机;同时,不局限于对译介文本的钻研,还要将思考蔓延到译介文本的反面,去研究那些未获翻译资格的作品,从文学被排斥的现象来揭示译语文化系统在特定时期对文学翻译选择规范的操纵;再者,不局限于译介文本自身,还要关注文本所引发的任何改编、评论、序跋、评注和期刊批评,因为它们都是操纵的直接体现,也对文本产生强烈的辐射意义;最后,不局限于译介的直线线索,还要考虑到同时期内比较文学范围内的文本互动性的比较和影响。

第四节 研究方法

如前所言,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使得译学研究走出原先具体而微的规约性研究,翻译被推至政治、意识形态、经济、文化的宽广语境中去描述,去分析。这种描述性的翻译研究方法始于20世纪70年代埃文·佐哈尔提出的多元系统理论(polysystem theory),此后,吉蒂昂·图里(Gideon Toury)、安德烈·勒菲弗尔(Andre Lefevere)等人在此基础上,渐渐深入完善,从文化研究的各个视角切入翻译问题,形成了翻译研究领域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文化转向,对诸如诗歌翻译的课题而言,具有不少可供借鉴、引证之处。

本书综合借鉴勒菲弗尔、佐哈尔等人的翻译理论,以“意识形态”(ideology)、“文化操纵”(cultural manipulation)、“翻译规范”(translation norms)、“动态经典”(dynamic canon)等文化学派中的关键词语,作为论文铺陈的理论依据。下面对这几个关键词——作些介说。

“意识形态”在翻译研究的领域中,指的是在特定时代文化语境中